

德国的伊斯兰教及其对穆斯林移民的影响

李 光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作为德国的第二大宗教,在德国的穆斯林社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为穆斯林们提供宗教需求之外,伊斯兰教组织还承担了社会保障的责任,这使得穆斯林移民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日益依赖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教组织大多与穆斯林移民的母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得穆斯林社区与德国主流社会相隔离。德国社会的世俗主义倾向与穆斯林社区不断强化的宗教信仰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教育、着装以及清真寺建设等方面。

关键词 德国穆斯林移民 伊斯兰教组织 世俗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邦德国相继与土耳其(1961 年)、摩洛哥(1963 年)和突尼斯(1968 年)等几个伊斯兰国家签订了劳工引进协议,以土耳其人为主体的穆斯林劳工开始大量进入德国。^① 随着这些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也一跃成了德国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

一、德国的伊斯兰教组织

(一) 形成与发展

1973 年前,进入德国的穆斯林劳工大多是年轻的单身男性,合同也多在 3 年内,因而德国政府并没有考虑为他们提供宗教活动场所。来自土耳其的劳工们于是开始自己在所居住的旅馆以及工作的工厂中建起了祈祷室。最早的阿訇主要来自于劳工,且没有受过正式的宗教训练。“这些早期移民进行的伊斯兰教仪式只是基于移民劳工的日常实践和习惯,而非基于正统的神学教义的一种大众化的伊斯兰教。”^②

1973 年石油危机后,西德政府开始出台政策鼓励外国劳工返乡,一部分移民回到了家乡,但多数土耳其劳工还是选择留下来,并将家人也带到了德国。这样,“事实上,招募的停止改变了德国的民族组成和社会结构,那些非德裔人士从劳工移民变成了定居者。”^③ 随着家庭团聚的开始,穆斯林移民对宗教的兴趣和对宗教场所的需求开始上升,但由于德国社会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宗教需求,这些穆斯林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来满足需求。第一批正式的清真寺修建在被废弃的工厂里和穆斯林住所的后院中,接着有许多阿訇从土耳其来到德国主持清真寺。随着土耳其人在德国建立了完整的家庭,他们的住所由廉价的旅馆变成了相对隔离的穆斯林

^① Alba, Richard D., *Germans or Foreigners?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in Post-Reunification Germany*, New York, 2003, p. 31.

^② Shreen T. Hunter (ed.), *Islam, Europe's Second Religion: The New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 38.

^③ Nielsen, J. C., *Muslim in Western Eur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社区,从而导致了穆斯林社区在德国社会中的孤立,也使得伊斯兰教日益成为维系他们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的纽带。

当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由客籍劳工变为定居的少数族群后,许多挑战便开始冲击他们的信仰了。德国的学前教育80%是由基督教会来兴办的,缺少符合伊斯兰教要求的托儿所就成了一个问题。“在穆斯林聚集的地区里,托儿所的人员、教师以及社会工作者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新客户的时候,遇到了文化问题。”^①德国穆斯林移民于是在伊斯兰教组织中寻求得到德国社会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德国的经济衰退和接踵而来的失业浪潮又导致穆斯林移民把伊斯兰教组织作为非正式的社会保障组织,伊斯兰教组织一直都扮演着其社会支持与物质援助者的角色。

此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土耳其移民的一系列暴力袭击行为刺激了德国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激进主义情绪,而以穆斯林保护者自居的伊斯兰教组织对暴力排外事件的强烈谴责更加深了穆斯林移民对其的依赖和信任。“当90年代土耳其人对暴力的恐慌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时,伊斯兰教组织为土耳其人,甚至是那些在德国出生并逐渐形成土耳其-德国双重认同感的土耳其人提供了安全感和接纳感。”^②

许多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的德国穆斯林移民比年轻的时候更强调伊斯兰教,这不仅仅是因为伊斯兰教组织给他们提供了所需的服务,更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要求每位信仰者在其有生之年偿还对真主的亏欠。对于第二代德国穆斯林移民而言,他们的宗教倾向是和其在德国社会中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德国受教育背景和熟练运用德语的能力,本来颇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提高社会地位,而他们的这种希望越强烈,那种由于社会歧视和机会限制而被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所带来的失落感就越强烈。伊斯兰教则为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和价值上的认同。

总之,尽管大多数德国穆斯林移民不再相信“回归”的神话,但是当他们在德国社会面临一系列生活问题时,都是伊斯兰教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使得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日益依赖伊斯兰教组织,这正是德国伊斯兰教组织日益强大的原因。

(二) 结构与主要功能

德国大部分伊斯兰教组织都是建立在清真寺协会之上的。据估计,德国大约有2200多个清真寺协会,其中多数属于土耳其人所有,以柏林为例,在全部70座清真寺中有58座由土耳其人管理,大部分清真寺由于并没有得到外界的承认而被命名为伊斯兰文化中心或伊斯兰文化协会等。最主要的非土耳其伊斯兰组织是由沙特阿拉伯建立的世界伊斯兰委员会,它只接受逊尼派成员,宣称拥有700名会员。德国绝大多数清真寺都属于逊尼派,但是在汉堡有一个什叶派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是由伊朗移民于1953年始建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完工。伊朗人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更关心宗教和文化事务,而不是移民的生活及相关问题。^③

在整个德国,只有66个专用的清真寺,其他清真寺一般都兼具多重功能,向成员提供诸如《古兰经》讲授、德语教学、运动场所、图书借阅、影碟租赁等诸多服务。许多伊斯兰教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教育机构,主要对教士和阿訇进行培训、对穆斯林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等。许多大型穆斯林教育机构正试图得到德国政府对其私立学校地位的承认。

德国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组织则是一个兼具伊斯兰元素与土耳其色彩的综合体,它以伊斯兰教作为集体认同的基础,同时又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非常关心。对于许多赞同土耳其伊斯兰化的人而言,海外的宗教组织,尤其是德国的这些伊斯兰教组织发挥着土耳其国内政党的作用。

^{①②} Alba, Richard D., *Germans or Foreigners?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in Post-Reunification Germany*, p. 82, 167.

^③ Steven Vertovec and Ceri Peach (eds.), *Islam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and Community*, Macmillan Press Ltd., p. 247.

在德国,这些伊斯兰教组织一般被称为“社团”,在德语中,“社团”这一概念通常是指拥有一定组织机构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社团”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选择性的认同。对于土耳其社团来说,他们努力创建和拥有自己特殊的空间,包括学校、清真寺、电台和媒体。“这些土耳其伊斯兰社团的行为并不是源自于精神的需求,而是与一种更宽广的都市体验感相关。”^①

总之,伊斯兰教保护并稳定了穆斯林社区,维持并传承了本土文化,加强了其成员的穆斯林身份意识,但使得穆斯林社区日益隔离于德国的主流社会之外。

(三) 德国主要的伊斯兰教组织

1. 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协会(Diyanet Isleri Turk – Islam Birliği,简称DITIB)是由土耳其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也是德国境内最大的伊斯兰教组织,它拥有740个清真寺组织,下设16个协会,正式注册会员有约20000人。^②

土耳其政府于1972年开始关注德国的土耳其劳工,开始只是由土耳其宗教事务委员会分出一部分职能来处理相关事务,而DITIB的正式成立则已经到了1982年。DITIB借着土耳其官方的力量,很快就成了德国最大的伊斯兰教组织。土耳其本国奉行凯末尔主义,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将宗教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同样,DITIB在德国也隶属于当地土耳其领事馆,其阿訇和宗教教师属于土耳其政府雇员,工资由土耳其政府支付,在德国服务满5年后必须回国。DITIB这种世俗主义政策在确保土耳其政府的控制力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影响力。

DITIB有15个宗教文化协会,其中11个是清真寺组织,其余4个分别是青年俱乐部、古兰经学校、妇女协会和丧葬协会。各地的DITIB主席都是由当地的阿訇选举出来的。按其章程所规定,DITIB的主要功能包括:维护伊斯兰教在各领域的地位,以伊斯兰教的方式来进行教育,为其成员去麦加朝圣提供经费支持,以及依经济状况,向有需求的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相对于其他伊斯兰教组织而言,DITIB的政治兴趣要淡得多。DITIB的前主席比尔吉奇(Veli Bilgic)这样表示“我们不能有政治立场,如果我们从事政治活动将会给我们带来伤害,我们只关心宗教事务。”^③

2. 德国伊斯兰联盟(Avrupa Milli Gorus Teskilatiari,简称AMGT)成立于1976年,是德国最大的非政府伊斯兰教组织,其大部分成员都与土耳其前国家拯救党以及繁荣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前国家拯救党的前身是国家秩序党,该党因为反对土耳其的国家世俗主义政策而于1971年遭禁。不久,该党又以国家拯救党的名称重建,但在1980年再次被禁,其成员中有许多人去欧洲进行发展,而留在国内的一些成员后来又成立了繁荣党。20世纪80年代后,土耳其国家拯救党事实上是在繁荣党的控制之下的。国家秩序党、国家拯救党和繁荣党都是伊斯兰色彩浓厚的宗教性政党,它们力图使土耳其恢复到遵循沙里亚法的伊斯兰传统政治制度上去。繁荣党在1994年土耳其的城市选举中,赢得了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在内的24个选区的胜利,但在1998年1月,繁荣党被土耳其宪法法院以违宪的名义解散。^④ AMGT拥有30个分支机构和200个协会。德国各地区的AMGT主席的任命需要得到AMGT中心办公室的批准,各地区的AMGT主席一起构成了AMGT的领导层。

3. 另一个重要的非官方伊斯兰教组织是伊斯兰文化中心(Islamic Kultur Zentren,简称IKZ)。它其实是土耳其国内的苏莱曼(Suleymanly)运动在德国的组织。Suleymanly运动是一种带有神秘

① Steven Vertovec and Ceri Peach (eds.), *Islam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and Community*, p. 249.

②③ Pedersen Lars, *Newer Islamic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p. 27, 28.

④ 刘云《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23—27页。

主义倾向的宗教运动,其关注点在于对青年进行宗教教育,因其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而于1974年被土耳其政府所禁止。Suleymanly运动发展到德国后突飞猛进,IKZ拥有160个清真寺和134个穆斯林社区。IKZ又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分支机构。IKZ具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但它常常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某些伪装,如1980年,德国贸易联盟控告它在所有的土耳其语出版物中支持原教旨主义分子,但在德语出版物中,又强调自己的整合意愿。^①

二、德国的伊斯兰教育

(一) 伊斯兰教育在德国的社会地位

关于宗教教育,德国宪法第七章做了明确的规定:公共学校中的宗教课程是规定课程的一部分,宗教课须按其宗教组织的教义并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教授。根据这一条款,德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统一任命教师、编订课本,家长们可根据自身的信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课程,亦可以不让孩子上宗教课。然而,德国穆斯林孩子却不能像基督教孩子一样享有在公共学校中上宗教课的权利,这主要是缘于德国对教会地位的规定。德国的宪法确定了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关系,但同时又保护了两者在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合作,这是因为德国的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90%多,教会的“公共合作”地位可使其获得从受教民众直接收税的权利,而这些税收通常被用于宗教活动、社会福利和教会的教育工作。2000年,德国教会的税收达到80亿欧元。但是,德国宪法对于宗教团体获得“公共合作”地位有着明确的标准:该团体在某地的存在要超过30年;其成员人数要占当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以上;该团体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该团体必须正式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并由地方政府确定是否符合要求。

德国许多地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都已获得了“公共合作”的地位。尽管有一些穆斯林团体向地方政府提出过申请,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家穆斯林团体获得了这一地位。对此,德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穆斯林团体的申请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宪法的要求,一些团体没有足够的成员,另一些团体则被视为不具有代表性或不够民主。由于伊斯兰教组织没能获得“公共合作”的地位,德国地方的公共学校也就没有开设伊斯兰教课程的义务。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之所以未获得“公共合作”的地位与它们的一些特点直接相关。德国的伊斯兰教组织众多,教派林立,在全德约有2000多个组织,这些组织在观点上和行为上缺乏协调性、统一性,显得散乱且弱小。以最大的伊斯兰教组织DITIB和AMGT来说,它们的正式会员都不超过2万人,更不用说其他的伊斯兰教小团体了。因而,在德国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团体可以作为穆斯林的代言人,与政府进行协商。此外,许多伊斯兰教团体都有一种激进、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在妇女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上坚持传统的做法,对政治又有过分的热情,这些特点恰恰都与德国个人自由、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相对立。

(二) 伊斯兰教教育在德国各地的表现

德国伊斯兰教教育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缺少完整的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课程,而只是将宗教课作为对宗教的一种客观性的了解;德国联邦制的政治制度导致联邦各州在伊斯兰教教育方面的表现各不相同;德国联邦各州政府希望通过伊斯兰教教育的形式向穆斯林学生传达出社会整合的信号。

在德国各州,穆斯林移民只能得到一些有关宗教常识方面的课程的学习,只能了解宗教的仪

^① Tomas Georg Lithman(ed.), *The New Islamic Presence In Western Europe* , 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 1998 , p. 81.

式、文化与历史 在学习中 学生只是客观的旁观者 而不是真正的信仰者 而穆斯林家长们则希望孩子们能获得教义阐释方面的学习 成为真主的信徒。在穆斯林移民的不断努力下 德国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开始出现松动 比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就率先向穆斯林学生提供了伊斯兰教义诠释课 成为德国联邦各州的先锋。该课程的教科书由本州的教育部门统一印制 具有明显的宗教信仰特色 如在封面上写着“除了安拉 再无他神”。正文附以标准的阿拉伯文的祷告词“以最仁慈最善良的安拉的名义”。

但在不来梅 穆斯林学生们连宗教常识课都没有 只有针对德国土耳其裔的课程 仅包括土耳其语和伊斯兰传统的一些内容 而且 是由土耳其政府所委派的世俗人士来教授。在汉堡 当局为了防止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社会分裂 采取将各种宗教信仰混合成一门宗教课的办法。汉堡一位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人这样形容当地伊斯兰教教育的尴尬“在汉堡 一些学校 60% 的学生是土耳其人 其他还有希腊东正教徒、俄国东正教徒 只有 2%—3% 的新教徒 但我们却不得不上有关新教的课程。”^① 与伊斯兰教组织的反对不同 当地老师却很支持这种跨宗教的教育。在柏林 地方议会与土耳其的总领事馆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 根据协议 从 1985 年开始 每周为土耳其学生加上 2 小时的伊斯兰教课程 该课程经议会讨论后确定 由隶属于总领事馆的老师来教授 课本来自于土耳其。柏林的宗教教育因为基本上是从土耳其直接引进的 因而教学内容与德国土耳其学生的真实生活相脱节。例如 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上就有这样的内容“我的祖国是土耳其 我爱土耳其胜过爱我的生命 我热爱那面有着星月的美丽旗帜 我热爱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图尔克——我们的救星、我们共和国的伟大英雄 我热爱所有的伟大的土耳其人。”^②

德国政府希望通过将伊斯兰教教育引入公共学校的做法 使穆斯林学生认识到 自由、民主思想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是相容的。根据这一想法 德国联邦各州的文化部长常务会议在 1984 年建议 宗教教育应当帮助穆斯林孩子在非穆斯林世界中发展一种穆斯林身份认同 应当帮助穆斯林孩子和穆斯林青年理解、接受德国的社会价值和规范 并容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价值体系的差异。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为例 当地政府因率先在学校中开设伊斯兰信仰课程而闻名 但在其课本中 还加入了一些现代的自由、民主思想 以使将来能够较容易融入德国的主流社会。

除了教育内容外 在德国学校中开展伊斯兰教教育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在于土耳其少数民族在教育类型方面难以达成一致 正统人士更倾向于建立特殊的古兰经学校 这些学校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之外 与德国公共学校中的宗教教育没有联系。由于古兰经学校的学习时间在常规的学校学习之外 古兰经的学习就需要占据学生们的课外时间 耗费学生们过多的精力 学校的老师往往指责这种教育的消极影响 造成社会孤立、缺乏整合的能力与意愿、人格发展受阻等。

三、伊斯兰教对德国族群关系的影响

(一) 德国的宗教环境

德国的法律宽泛地保证了个人的信仰自由 基本法第四章规定“宗教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基本法同时也保护了信教者可以将其宗教习惯带到实践中的权利 比如拥有在宗教休息日不上班的权利以及拒绝服兵役等。但是基本法对宗教信仰过于宽泛的解释却遭到了穆斯林的批评 他们认为尽管宪法给自己提供了争取宗教实践的机会 但德国的基本法是根植于基督教世界观之上的 而穆斯林的宗教实践与德国的宗教政策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 比如家庭法、丧葬习俗、宰杀牲畜

^{①②} Tomas. Georg. Lithman(ed.) , *The New Islamic Presence in Western Europe* , p. 86.

等方面。^①

(二) 德国宗教原则间的矛盾

如同在法国和英国一样,德国宗教的世俗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德国主流社会中,传统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了。据统计,2003年德国有近2700万天主教徒和2600万新教徒。1976年,约有1/4的德国人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上教堂,到1992年,只有10%的人这样做;而世俗主义者的份额则在不断增加,从1977年的18.3%上升到1995年的25%。同时,传统基督教教义的信仰者相应地在减少,1967年42%的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1992年,只有29%的人相信这一说法。^②

但与此同时,大量进入德国的穆斯林移民却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力。1962年,德国只有5万名穆斯林移民,而7年后,据官方统计,穆斯林移民已超过25万人。1981年大约有170万名穆斯林移民,到2002年则有305万人。大约有75%的穆斯林声称自己按照宗教规定在清真寺里做礼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③

随着德国宗教的日益世俗化,穆斯林移民害怕德国宗教政策的制定者们会认为宗教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因而仇视穆斯林的公共性表达。事实上,围绕穆斯林的宗教性服饰和建筑产生的矛盾和纷争在德国不断出现。最著名的要数卢丁(Ludin)事件了。弗里斯特·卢丁(Fereshta Ludin)是一位阿富汗裔的德国穆斯林,她曾经戴着头巾读完了大学,但是1998年,当地的文化部长却以她戴头巾违反了法律的理由拒绝了她担任政府宗教课教师的申请。Ludin将政府告上了法庭。2002年,联邦执行法院支持了部长的决定,但在2003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撤销了执行法院的判决,Ludin最终获得了胜利。^④

(三) 清真寺的修建与族群纠纷

由于独特的外观与宗教功能,清真寺的修建往往会引发穆斯林移民与当地德国人的纠纷。曼海姆市的清真寺的修建就相当富有戏剧性。1984年,穆斯林社团领袖与市政府讨论修建清真寺的事宜,但遭到了当地市民的集会反对,因为他们害怕修建清真寺会引来更多穆斯林移民。六、七年后,穆斯林社团与当地的天主教会、新教教会以及曼海姆市外事办公室达成一致,由当地的基督教教会出面,平息了人们对于修建清真寺的恐慌。1993年,市政府最终同意了修建计划。1995年,一座能容纳2500人的清真寺建成了。^⑤

斯图加特市的情况则不同。1999年,一个伊斯兰组织购买了一块土地,打算用来建造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但遭到了市民与政府的一致反对,理由是担心噪音与交通堵塞,也有人害怕当地会被穆斯林占据。这一事件分化了当地政党,基民盟和共和党反对,而绿党与社民党支持。此外,土耳其领事馆也反对这项计划,因为该市已经有足够数量的清真寺。政府最终否定了修建计划。^⑥

德国穆斯林在修建伊斯兰风格的高塔时也遇到了困难,德国人认为过于醒目的伊斯兰标志会影响当地的建筑风格。此外,穆斯林还被禁止使用扩音器召唤人们去做礼拜,因为这被认为会扰乱当地秩序,大多数穆斯林则抱怨,无处不在的基督教教堂的钟声同样扰民却没有入管。

四、结 语

许多德国穆斯林都会抱怨德国主流社会存在对伊斯兰教的偏见,这是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偏见体现的不仅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而且是基督教的个体性与伊斯兰教的社

① Shreen T. Hunter (ed.), *Islam, Europe's Second Religion: The New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p. 109.

②④ Joel S. Fetzer, J. Christopher Soper, *Muslim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5.

③⑤⑥ Shreen T. Hunter (ed.), *Islam, Europe's Second Religion: The New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p. 113, 115, 115.

会性之间的矛盾。

德国宗教改革后,基督教逐渐从公共领域中退出,进入了私人领域,成为了个人的事情,而伊斯兰教则不同,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公共性表达上,比如宗教学校里的学生必须大声诵读古兰经,穆斯林妇女必须在公开场合戴面纱或头巾等。因而,可以说,伊斯兰教本身就体现在其信徒的公开宗教实践中。就宗教标志物来说,跟头巾与伊斯兰教的联系类似,十字架同样可以让观察者联想到基督教,然而,问题在于基督教并不需要通过十字架来表达自身,但穆斯林妇女却要通过戴头巾来表达自己的信仰。这样,伊斯兰教的公共性就与德国的世俗主义所强调的宗教个人主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对于双方往往都是根本性的,很难得到调和。于是,德国的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社区之间就会产生强烈的隔阂。

作为一种极端入世的宗教,伊斯兰教渗透在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并非像基督教那样仅仅集中在个人的精神领域。伊斯兰教与传统生活特征紧密相关,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伊斯兰教本身造就了这种传统生活特征,所以,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信就导致了他们对伊斯兰教传统的遵从,而传统的根源始终在文化底蕴丰厚的母国,于是,伊斯兰教就拉近了穆斯林移民与母国的心理距离。比如,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与母国的联系异常紧密。他们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德国政治的关心,甚至努力通过自己的经济、社会力量来影响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以至于被称为土耳其的海外政党,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移民跨国政治行为。

综上所述,对于德国的穆斯林移民而言,除了作为一种信仰外,伊斯兰教日益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类伊斯兰教组织在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价值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伊斯兰教组织的蓬勃发展也造成了穆斯林移民社区的日益自我隔离,缺乏与德国主流社会进行整合的意愿。同时还由于伊斯兰教独特的公共性表达方式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穆斯林移民在宗教教育和清真寺修建等问题上与德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纠纷。

Abstract As the second religion in German, Islam has been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Muslim communities. The Muslims rely on Islam organizations not only for religious observance, but also for welfare and security. German Muslim communities established extensive and intimate connections with their home countries. It makes them segreg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of Germany gradually.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ecularization tendency in Germany mainstream society and increasingly strong faith of Islam in immigration community, such as religious rites, education, dressing etiquette, mosque building and so on.

(李光,讲师,广东惠州学院,惠州,516007)

(责任编辑:黄海慧)